

教育理论工作者社会责任之讨论

谭 诤 王 琪

社会责任是因社会分工不同而产生的对不同社会成员应尽义务的要求。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社会责任。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对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探讨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对于他们更好地服务社会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5月,在厦门大学潘懋元先生的周末学术沙龙上,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教师和研究生们就教育理论工作者社会责任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辨析,旨在启发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现将这两次沙龙的讨论简单整理,与读者共赏。

一、教育理论工作者社会责任的内涵探讨

在讨论过程中,讨论着经常涉及到社会责任和教育理论工作者社会责任的概念问题,并就这两个概念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博士生车如山认为,当前学术界对社会责任的讨论大多集中在企业的社会责任范畴,所指的是一种道义上的、援助性的和慈善性的行为范畴,但这与教育理论者所指的社会责任不同。目前教育理论工作者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存在把本身职责和社会责任混淆在一起的现象,社会责任应该是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个人对社会应尽的更高层次的责任。比如,教师教好书是教育者的职责,而不是社会责任。博士后刘宗劲也持基本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从本质上讲,社会责任就是在份内工作之外增加的一种责任,建立在能力和意愿的基础上。

来自江西赣南师院的访问学者邱小云教授也认为,做好本职工作并不属于社会责任的范畴。他认为社会责任通常是指组织承担的、高于组织自身目标的社会义务。如果一个企业除了生产的任务以外,还长期承担了对社会其它方面有利的义务,这就是社会责任。如化工厂除生产化肥外,同时还要承担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就是它的一种社会责任。教育理论工作者探求未知是他的本身职责,而其理论成果要对社会负责是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一种社会责任。比如缺乏实践依据的主观臆想、没有可行性的理论成果就有可能对实践产生误导。因此,要区别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两个概念,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引导学术责任。

对于本职职责和社会责任的概念范畴问题,有的研究生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博士生王琪认为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角色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理论工作者的职业是学术职业,这种职业性质决定了他的社会责任。劳动分工是任务的界定和委派,同时,也是特定责任的分配。所以探讨社会责任是必要的。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是从事学

术职业的人应该担当的责任，学术职业的首要责任应该是发现知识，这是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同时还应该将自己的发现公布于众，从而产生社会预测和预警等作用。

博士后汤晓蒙根据社会角色理论把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分成了三种：第一种是生存性角色——知识传播者，即社会赋予大学教师（理论研究者）的最基本、最本源、最共通的角色期待与角色职责，是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第二种是发展性角色，是指作为知识人，为了更好地胜任知识贡献者和真理发现者的角色，需要主动承担科学发现的社会责任，这是理论研究者全方位胜任知识人社会角色的客观需要；第三种是超越性角色，是指在充分履行社会所赋予的生存性角色和发展性角色的基础上，超越学科专业领域，纯粹发乎自我、发乎人性地观照公共领域，这是一种自我超越的体验和人类情怀。

对于什么是社会责任和什么是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形成了两种观点，即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本职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范畴是包含关系还是并列关系。虽然参与者的观点和认识还没有从学理上进行深入的论证，但已经在辩论的基础上逐渐明确了问题的实质，也开拓了思维的范围。潘懋元先生也对什么是社会责任以及什么是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提出了供大家思考的角度。他指出：“什么是社会责任？可以从社会学、道德学和法律学等角度来回答。例如，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从道德学的角度来定义的：企业要诚信是社会道德，企业以其赢利用于扶贫、赈灾等是社会责任。教育理论工作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如批判、引领和预测等等，是从文化与社会学的角度来定义的。但有些责任是教育理论工作者不应该承担或者承担不了的。如政策的制定，因为理论工作者没有决策的权力。”

二、对教育理论工作者社会责任的多维度思考

在讨论中，参与者不断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诸多的思考，并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下是参与者结合高等教育问题从不同视角发表的观点。

（一）追释或引领

博士生夏琨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存在的两种现象，即追释和引领入手，分析和思考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她认为，追释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对现实问题的偏好；二是对热点问题的追逐；三是对西方流行理论的追逐。对热点问题的追逐，行政言论的追溯，往往导致理论工作者理性的丧失。热捧西方流行理论，表现出对西方理论的依附性，往往导致对中国高等教育现象的简单处理。而引领表现为对高等教育的发展理论研究，做出客观的预测和预警等。所以，引领应该是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这一观点的提出引发了大家激烈的讨论。首先，大家不认可“追释”这个词的运用。博士生陈紫认为，“追释”这个词是个中性词，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比如理性的和批判性的解读就是褒义。车如山也认为先入为主地界定“追释”这

这个词是错误的，因为只界定了这个词的贬义部分。董立平博士认为我们对现实和政策的追问就是一种反思和批判，是应该值得提倡的。

潘懋元先生在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理论和政策的关系问题，理论应当走在政策制定的前面，但政策制定后对其进行解读也是必要的。既不当认为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只在于解读政策，也不要认为理论工作者不应当或不必要向社会解读正确的政策。引领与解读都应该是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二）理论与研究与理论宣传

董立平博士把理论工作者区分为理论研究者与理论宣传者两类：理论宣传者主要是宣传政策；理论研究者社会责任强调研究问题的真实性，既关注国家教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同时也关注微观的问题，凡是有利于社会改革发展的问题，都值得理论研究者关注。此外，他还认为理论研究者要具备超功利性思想，应与社会国家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能仅仅尾随现行的政策，因为理论研究者的责任之一就是引领，站在未来社会发展的角度指引方向，给予理论上的支持。

博士生王琪也认为，理论工作者是一个群体，是分工的，有的人应该在理论上进行引领，而有的人需要结合现实对政策进行诠释。因此，有一部分人是专门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有一部分人着重研究政策的实施。

（三）理论预测与政策制定

王琪从理论预测和预警的角度来分析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问题。认为预测和预警是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这是由理论的性质决定的，因为理论是理性凝结的产物，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普适性。抽象性表示它是高度涵盖各种现象的知识凝结，普适性表示它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涵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现象。而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如何进行理论预测和预警呢？王琪认为，要结合教育规律，根据教育规律预测教育发展趋势。其次，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不是机械式的线性输入和输出，必定会受到各种情况的影响。

对于这一角度的思考，潘先生给出了点评：“什么是预测呢？预测就是理论的运用、规律的运用，讲清楚如何利用规律进行理论预测和预警。但要注意，不能生硬搬用理论、规律，要结合时间、空间、环境条件等等进行研究。既然是规律，就可以重复出现，但又不是完全相同。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但历史不会重演。因为有一定的规律性，所以历史才会相似；又因为条件不同，环境不同，所以历史不会重演。”

（四）历史视角的审视

博士生冯用军从历史的视角讨论了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身份认同危机及其社会责任。他选取了新中国建国60年来高等教育的五次重大决策进行分析，第一次是《高教六十条》的制定，第二次是1978年恢复高考的决定，第三次是1999年的高等教育大扩招政策的制定，第四次是20世纪90年代的高校大合并政策，第五次是刚刚发布不久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制定。希望通过分析这

五次高等教育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决策主体的学科背景，来探讨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参与或缺失，进而反思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相继出现在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舞台，而往往缺少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身影，显示出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身份认同危机。

对这一问题，潘先生感慨道，“说实在的，你所提到的第一次、第二次与第四次教育政策制定，教育理论工作者没有起到作用。更早的还有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院系调整等，都是政府部门的操作，理论工作者并没有参与其中。到扩招政策制定时，理论工作者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但是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经济学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制定，教育理论工作者才较多地参与了。”从潘先生的话语中，也可以看出老一辈教育理论工作者对教育理论工作者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的忧患和喜悦。

三、余韵

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闲暇”的沉思才能发展人的理性。我们更倾向于将这种“闲暇”理解为思想的自由而非无所事事。学术沙龙就给我们提供了这种“闲暇”，其间既有家庭与学校的温馨，也有学术的严谨。在沙龙里，每个人都可以围绕讨论的主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启发、点拨。

加拿大幽默散文家兼大学教授斯蒂芬·利考克在《我见之牛津》里谈到，牛津导师所做的就是召集少数几个学生，向他们喷烟。被系统地喷烟，喷了四年的学生，就变成了成熟的学者。一个被烟熏透的人，就能说优雅的英语，写优雅的英文，其优雅的风格是靠任何其他方法都学不到的。这也就是所谓的“熏陶”吧。梅贻琦先生也曾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沙龙里的交流就是一个“喷烟”和“从游”的过程，在不知不觉中，在不断的“喷烟”和“从游”的过程中，一个个“成熟的学者”成长起来，那些从这里走出去并在不同岗位上履行着各自责任的高等教育学人，便是最好的见证。

作者简介：谭 诤，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王 琪，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卢彩晨

责任校对：清 风
